

中国 40 年来的俄罗斯政治研究

费海汀

【内容提要】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学者对俄罗斯政治抱有天然的关切。俄罗斯的现实政治状态和政治发展经验对于中国而言都有着特殊的意义。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学界开始尝试从静态的政治结构与体系和动态的政治发展与进程两个角度重新建构理解俄罗斯政治的知识体系。政治结构与体系包括政治制度、政治互动与政治精英研究三个方面，政治发展与进程则包括苏联解体与民主转型研究两个部分。就成绩来说，中国学者在对当代俄罗斯政治制度、政治互动、政治精英、苏联解体、民主转型五个领域的研究中总结出了一系列观点，为中国自身的政治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参照体系，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就问题来说，中国的俄罗斯政治研究在精细化的微观研究和理论化的宏观概括两个方向还存在不足，须从研究人才、议题设置、研究视角、理论建构四个方面继续提高。

【关键词】 俄罗斯 政治学 区域与国别研究 学术史

【作者简介】 费海汀，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引言：政治、区域国别政治与俄罗斯政治

政治学研究中的“政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政治”就是权力的支配与行使，但这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包括了极其丰富的内涵。从“权力”的角度看，政治学可以被理解为分析和解释政治权力、社会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宗教权力之间的同构与区别、冲突与协调的尝试；从“支配”的角度看，政治学可以被理解为认识政体（polity）如何建构，权力如何被构成、被分配、被代表的途径；从“行使”的角度看，政治学则可以被理解为阐释权力如何运转，如何作为一个社会过程产生作用，如何掌控与治理社会的方法。简而言之，即使只作最基本的区分，政治学学者对所研

究的“政治”也存在权力、制度、社会过程三种理解方式。

在具体到区域国别政治研究时，虽然政治学理论的抽象性得以降低，但其复杂性不仅没有得到简化，反而进一步加深。相对于宏观的政治学理论，区域国别政治研究的特点在于附加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政治事件和代表人物。这些具体因素的加入会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研究环境的变化会使其观察研究对象的视角和重心都出现转移；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说，转折性的政治事件或强力人物通常都会大大加强某个因素所能发挥的作用，从而使得既有理论的效度降低。这既可能意味着理论预估的结果被抑制住而没有出现，也可能意味着理论低估或忽略了某些因素的作用和意义。因此区域国别政治研究常常会受到具体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影响。

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样的具体影响既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方面，重大历史事件和转折本身就是一个检验理论的机会，它能使研究者跳出既有的阵营、框架、理论预设，对政治学的一些元问题进行反思。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许多固有的经验、既有的知识和理所当然的判断都不再可靠，必须对政治学理论体系中从公理到细节的每一个环节进行重新检视。这种事件并不总是能带来研究范式的转换，但它至少为理论的发展更新提供了机遇。

俄罗斯政治研究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者逐渐意识到，没有任何一套现成的理论可以照搬，必须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苏联解体以后，两极格局被打破，政治学理论中关于欧美模式和苏联模式的二元对立和争论自然消解。对于曾经“以俄为师”“以苏为师”的我国政治学研究者来说，无论在价值、观念，还是在心态上都必须进行根本性的调整。一方面，苏联解体意味着俄罗斯政治出现全方位的变化，因此必须全面研究俄罗斯人对自己国家、政府、政党、政权、宪法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期望和目标；另一方面，苏联解体证明了苏联的经验存在缺陷，因此对苏联学界关于政治的一系列理论预设也必须进行重新检验，以排除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潜在问题。实际上，俄罗斯现实政治状态和政治发展经验，也成为我国学者在俄罗斯政治研究中所关注的两个主要问题。

对于当代俄罗斯政治研究来说，其核心特征是不确定性。这样的不确定性包含“模糊”与“变动”两方面的含义，也存在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两个特点。模糊来源于俄罗斯政治复合状态所产生的复杂性。当前的俄罗斯政治是至少包括沙皇俄国政治文化心态、苏联政治习惯传统与欧美政治制度设计三期叠加的混合产

物。它既吸取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也保留了长期发展的历史记忆和观念。也就是说，它既具有不同政治模式的特征，也不完全符合任何一种既有政治模式的标准。变动则来源于不断变化所产生的不稳定性。当前俄罗斯的政治过程既有恒定不变的部分，也有向上发展的部分，甚至还存在向下回的部分。它不仅体现为传统和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区别，还包含优良传统借现代技术实现的良性发展，也包括现代缺陷与传统问题结合的恶性变异。也就是说，它并不能被简单看作一条大河，而是在主流之外还包含了许多不断变化的支流、回流和逆流。因此，认识和理解俄罗斯政治，既要具备静态的政治体系与结构视角，又要具备动态的政治发展与进程视角。而这样两方面研究视角的建立和大量经验、知识、结论的储备，正体现了我国俄罗斯研究界 40 年来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一 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和结构

在采取静态的政治体系与结构视角时可以发现，我国的俄罗斯研究在 40 年的发展中主要关注苏联解体后一系列政治要素的变化。其核心问题是，应该如何理解解体后的俄罗斯政治？它是如何构成、如何运转的？它包括哪些主要部分？谁（或什么）在控制、影响、执行俄罗斯的政权？

有学者曾将当代俄罗斯政治概括为制度、执政理念、议会和政党、司法、联邦、精英、思潮、社会、宗教、传媒、教育和民族十二个方面^①。也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治国理念、政治思潮、联邦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反恐政策与寡头问题七个部分^②。从理论的角度看，可以将十二个方面分别归入制度主义、多元主义、精英主义三种视角。制度主义将政治构成看作一系列的规范与准则，多元主义将政治运转看作不同社会集团的协商与互动，精英主义则将政治实践看作精英群体的决策过程。因此总体而言，可以从政治制度、政治互动、政治精英三个角度来观察我国学者在研究俄罗斯政治时的重心与主线。实际上，主题的选择与偏好本身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学界的理论预设。

^① 陆南泉总编、李雅君主编：《曲折的历程：俄罗斯政治卷》，东方出版社 2015 年版。

^② 郑羽、蒋明君总编，庞大鹏主编：《普京八年：俄罗斯复兴之路（2000～2008）》，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 年版。

（一）政治制度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我国学者主要关注包括宪法与法制，联邦制度与央地关系，总统、总理与行政机关，国家杜马与立法机关，官僚与腐败等五个方面的问题。这意味着，我国学者认为，对俄罗斯这样一个面临国家建构重任的政治体来说，五方面的问题尤为关键：其一，国家建构的基础是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建构一切政治制度和机构的基本准则，是从事一切政治活动的基本框架。其二，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国家的完整和统一。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必须保证中央权威，同时也为地方保留一定的自主权和能动性，使央地关系平衡、协调发展。其三，国家建构的关键角色是总统、总理、行政机关，特别是作为政治首脑的总统。政治首脑对自身角色与功能的认知往往决定了国家建构过程的顺利与否。其四，国家建构的重要保障是“府会关系”，即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协同配合的关系。如果二者始终处于对立状态，则基本的政治稳定都难以保持。其五，国家建构的主要威胁是腐败问题。官僚系统的配合意愿与配合程度决定了新政权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对种种危机的反应速度和处理能力，但官僚系统的腐败问题将会影响司法公正、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治理绩效，如何在控制腐败的同时保证对官僚系统的控制能力是新政权面临的最大挑战。

首先是宪法和法治。宪法与宪法监督是宪法和法治问题的核心。我国学者认为，在经过1993年的宪法危机之后，俄罗斯已经确立了一部新型的宪法。它确认了制度的转换，摒弃了苏维埃宪法制度，带有俄罗斯传统中个人专权的色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带有转型时期的鲜明特点^①。俄罗斯现行宪法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同时也具有深厚的潜力和可完善性，未来虽然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修宪活动，但在总统权限、议会多数、议会权限、强力部门隶属、地方行政长官、反对派权利、人权和自由等问题上依然存在随社会发展的可能^②。同时俄罗斯建立了宪法法院对宪法的实施进行监督，选择了通过集中式违宪审查模式来维护宪法的权威^③。宪法法院通过在司法自制和司法积极主义之间的摇摆来寻找

^① 王哲：《俄罗斯新宪法剖析》，载《中外法学》1994年第2期；李心华、于秀科：《俄罗斯总统与议会的宪法之争》，载《东欧中亚研究》1994年第2期；董晓阳：《俄罗斯宪法制度的演变与时代特征》，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1期。

^② 董晓阳：《新世纪俄罗斯宪法的演变趋势》，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2期。

^③ 任允正、于洪君：《俄罗斯联邦的宪法监督制度》，载《外国法译评》1999年第3期；庞大鹏：《宪法监督：俄罗斯司法机构的重要职能》，载《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3期；刘向文、赵晓毅：《谈俄罗斯联邦宪政建设的宪法基础》，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4期。

自己的准确定位。但由于俄罗斯的威权主义传统，它只对行政权起到了有限制约作用，要真正建立宪法权威尚需时日^①。另外，对司法体系改革的分析和探讨构成了这一领域我国学者研究的主要内容。司法体系改革的目标在于改变苏联时期的司法制度，提高法院地位，使法院脱离议会成为制衡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单独一极^②。因此司法改革的措施就包括建制（设立宪法法院、设立陪审团^③）和改制（改变法院隶属关系、改变检察机关职能）两部分。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的司法改革由于经济、政局、法条质量、司法腐败和公民权益问题进展缓慢^④。也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的司法改革规模过大，进程迂回曲折，动力不足，路径依赖问题严重，时常要依靠政权力量推动^⑤。但无可否认的是，自苏联解体以来，在宪法法院、法官、律师、仲裁、诉讼等各方面，俄罗斯的司法改革都已经逐渐摆脱震荡趋向稳定。有学者在总结这一过程时指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法制建设主要由政权推动，但举步维艰，始终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法制与社会变迁并不同步^⑥。也有学者认为，俄罗斯是一个低水平的民主化国家，政治精英正是在艰难的环境下依然坚持选择了通过法制的途径促进民主化发展^⑦。因此在建设法治国家时，俄罗斯一方面要推进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化进程与良性互动^⑧，同时也要注意演化与建构相互交融的改革之路^⑨。

其次是联邦制度和央地关系。新政权建立之初，俄罗斯政权无论合法性还是控制能力都大为受损，因此首要问题是如何说服各个地区维护国家的完整和统一，避免分裂。俄罗斯试图通过建立联邦制度来消除这一危机。有学者认为，虽然联邦制度的确立从法理上给予了俄罗斯一定的缓和空间，但共和国宪法与联邦宪法抵触、联邦主体的不平等地位、联邦主体对外交往权限和法律基础等问题依然威胁着国家的统一^⑩，同时存在着地方强硬派的抵制以及民族主义分裂势力的

① 尤晓红：《俄罗斯宪法法院在国家职权结构中的地位》，载《法学》2008年第10期；尤晓红：《论俄罗斯宪法法院与立法机关的关系》，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② 廉雅荣、薛瑞麟：《俄罗斯的司法改革》，载《诉讼法论丛》1998年第2期。

③ 陈瑞华：《陪审团制度与俄罗斯的司法改革》，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5期。

④ 刘向文、高慧铭：《试析俄罗斯联邦的司法改革》，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5期。

⑤ 范纯：《论俄罗斯的司法改革》，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2期。

⑥ 肖辉忠、燕玉叶：《9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法制建设》，载《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3期。

⑦ 庞大鹏：《俄罗斯的民主与法治》，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1期。

⑧ 马长山：《俄罗斯的市民社会诉求与“法治国家”定位》，载《求是学刊》2003年第1期。

⑨ 杨昌宇：《俄罗斯社会转型与法治之路》，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5期。

⑩ 刘清才：《俄罗斯联邦制度的发展演变》，载《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5期。

挑战^①。有学者认为，普京的联邦制改革虽然重塑了联邦观念、完善了国家权力体系、巩固了联邦、促进了民主，但依然有着集权化可能、央地不平等关系、缺乏宪法基础的缺陷^②。实际上，维护国家的完整和统一只是联邦制度的基本要求，建立一个协调发展的央地关系才是其主要目标。关于俄罗斯央地关系的调整，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的联邦制度实际上正在向单一制转变^③。但也有学者指出，经过90年代的激烈斗争，向心正在取代离心的趋势，政治矛盾逐渐让位于经济矛盾。换言之，经济权限的划分将成为俄未来央地关系间的主要矛盾^④。这一趋势具体会体现为地方通过政治上的服从向中央换取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因此俄罗斯的联邦制会表现为政治上更加集中，经济上更加分散^⑤。还有学者认为，从叶利钦时期协商式的联邦化整合到普京时期集权式的联邦化，俄罗斯的联邦制度建设的合法性基础将会日益由个人权威转向宪法和法律，由宪法一条约联邦制向制宪联邦制过渡^⑥。

再次是总统、总理及行政机关。俄罗斯在苏联解体的基础上构建新政权时，首先必须考虑的就是对总统作为一个政治机构的认识问题。对总统权力的定义实际上是政治精英价值理念、议会态度和民众改革意愿与历史记忆等多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从性质的角度，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的总统制接近法国式半总统制，但同时作为国家元首又拥有美国式总统制的权力，甚至还在历次斗争中获取了一些美国总统都不具有的权力，例如监督宪法、解散杜马、举行公决等^⑦。简而言之，俄罗斯政府虽然名义上向议会负责，但实际上由总统主持，且拥有优势权力，并不会受到议会的明显制约。总统除了行政权之外，同时还具有部分立法权与司法权，是总控三权的实际的国家元首。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形成了一系列直属于总统的实权机构^⑧。其二，从原因的角度，有学者评论，俄

① 赵龙庚：《俄罗斯联邦制的变革与面临的挑战》，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7期。

② 崔皓旭：《普京的联邦制改革》，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③ 李雅君：《俄罗斯联邦体制中的非联邦化趋势》，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2006年3月14日第3版。

④ 宋锦海：《俄罗斯中央—地方关系的发展趋向》，载《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4期。

⑤ 潘德礼：《解析普京的联邦制改革》，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3期。

⑥ 范建中：《俄罗斯联邦制度的现实矛盾和未来走向》，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1期；邱显平：《变迁中的俄罗斯联邦体制与民族问题》，载《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3期；朱进良：《俄罗斯政治整合的联邦化路径探析》，载《西伯利亚研究》2007年第3期。

⑦ 刘向文：《试谈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制》，载《东欧中亚研究》1994年第5期；赵龙庚：《俄罗斯总统制探析》，载《和平与发展》1997年第2期。

⑧ 刘清才：《俄罗斯总统制度及其特点》，载《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4期。

罗斯总统制的诞生是由于苏联末期制度资源短缺，难以适应复杂的社会变化，实际上是应对过渡时期混乱局面的权威主义临时措施。但旧制度对新制度的侵蚀，以及新制度的迟缓发展使得俄罗斯出现制度断层，于是总统制度也不断遭遇危机，不断陷入与议会、政府、地方、政党的摩擦^①。因此，其三，从现实的角度，虽然俄罗斯总统的权力已经稳固，但未来仍将面临关于总统职权、选举方式、社会基础、总统参政方式、宪法修改完善各方面的问题^②，仍需精英群体在价值观上达成共识、在政治实践中抱持妥协精神，还需建立一种保障总统制稳定运转，与各种政治力量沟通协商的有效机制，向法律型治理模式过渡^③。许多学者也观察到，俄罗斯政治精英在就任总统后，多次发起行政机构改革来解决体系本身的一些缺陷和问题^④。

第四是国家杜马和立法机关。俄罗斯国家杜马是政党政治开展活动的主要平台，因此杜马格局的变化一则映射着俄罗斯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二则能反映议会与总统、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间的关系。在俄罗斯这类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中，从议会角度判断国内政治局势是否稳定有三个重要标准：其一，议会是否两极或多极对立；其二，议会里中间力量所占比例；其三，议会中优势力量与行政机关的距离及对其态度。因此我国学者也正是从这三方面对俄罗斯国家杜马的选举情况及力量格局保持了长期和高度的关注。我国学者认为，从20世纪末的杜马选举开始，俄罗斯的政局已经逐渐结束了左右翼政治力量“非此即彼”的恶斗，转向民族爱国力量之间对国家权力的激烈争夺^⑤。由于受到政权青睐，同时也支持政权的“政权党”的出现，总统与行政机关的地位得到巩固，总统、议会和政府将进入密切合作的时代，俄罗斯的政治稳定将得到维持，政府政策的推行将会更加顺畅^⑥。另外，从祖国—俄罗斯和团结联盟，直到“统一俄罗斯”党，中间力量始终都能在议会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因此在俄罗斯的议会中实际上就形成了中间力量的绝对优势。左派力量遭到削弱，右派力量则完全被排挤出议

① 王桂生、胡宗斌：《政治制度化与俄罗斯总统制》，载《今日东欧中亚》1996年第6期。

② 宋锦海：《俄罗斯总统一议会制建设中的若干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7期。

③ 庞大鹏：《论俄罗斯政体》，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第4期；杨昌宇：《当代俄罗斯强权总统制的合法性及其危机》，载《求是学刊》2007年第6期。

④ 朱可辛：《普京以来的俄罗斯行政改革》，载《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刁利明：《现代俄罗斯行政改革的前提及其历史进程》，载《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10期。

⑤ 赵龙庚：《俄罗斯议会下院选举透视》，载《和平与发展》2000年第1期；李兴耕：《评俄罗斯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载《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4期。

⑥ 戴隆斌：《俄罗斯杜马选举后的政党政治格局及其影响》，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1期；庞大鹏：《俄罗斯政治进入新时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0期。

会。尽管如此，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仍会成为政府的智囊，但不会再对政权直接产生关系^①。但是，这一格局在第六届杜马选举时出现动摇。政治光谱不可能总是缺少一翼，即使统俄党自身也不得不对自己的定位进行调整^②。同时，我国学者还对俄罗斯杜马和政党选举制度保持了关注。有学者判断，在俄罗斯政党体制的调整下，未来在杜马中活动政党的数量将会减少，逐步出现一个只有三、四个分别代表中、左、右翼政党的稳定的三角形结构，建立一个在总统高度集权条件下的多党制模式^③。有学者评论，多中心平衡的权力布局模式不适合俄罗斯，俄罗斯在可望的将来，更可能仍然保持一个权力中心的格局^④。但有学者认为，在2012年遭遇大规模抗议之后，这一格局也开始出现松动，当局开始在巨大的压力下逐渐放松对多党竞争的控制^⑤。

最后是官僚与腐败。腐败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问题。腐败问题并不只是一个现象，而是涉及官僚系统的执行能力问题。换言之，腐败问题本身大量出现在政治构建不完整、不充分的时间和地区，而且当腐败问题严重时，就意味着社会需要向政治制度支付的维护和运转成本大幅提高，但政治制度实现的治理绩效却大幅降低。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政治转型期，腐败问题还意味着正常的政治建构被暗箱交易所替代，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俄罗斯至少存在贪污型、互惠型、勒索型、渎职型四种腐败形式^⑥。腐败现象甚至蔓延到了司法领域，具体表现为个人腐败和影响正常政治生活的政治腐败^⑦。腐败与政治斗争紧密缠绕，政治权力过于集中，社会政治发展的不稳定因素都助长了腐败的蔓延，阻碍了腐败的治理。有学者认为，俄罗斯腐败问题最严重的表现是，腐败现象已经带有制度性、普遍性与合法性，且社会已经对腐败有了很高的容忍度，同时腐败治理的主要部门司法机关在本身力量虚弱的情况下同样出现了严重的腐败^⑧。对于俄罗斯打击腐败和治理腐败的措施，我国学者都保持了高度的关注。有学者指

① 孙凌齐：《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对未来俄罗斯政局的影响》，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1期。

② 姜毅：《解读俄罗斯杜马选举风波》，载《当代世界》2012年第1期。

③ 李兴耕：《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制度改革及其影响》，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李兴耕：《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前的俄罗斯政党基本态势》，载《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2期；李兴耕：《俄罗斯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评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5期。

④ 黄登学：《“一党制”+“议会制”？——后普京时代俄罗斯政治发展透视》，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1期。

⑤ 庞大鹏、陆南泉：《2012年俄罗斯总统大选背景、特点及前景》，载《探索与证明》2012年第2期。

⑥ 戴隆斌：《俄罗斯的腐败及其后果评析》，载《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3期。

⑦ 崔皓旭：《俄罗斯司法腐败透视》，载《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年第11期。

⑧ 陆南泉：《关于俄罗斯腐败问题的评析》，载《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2期。

出,90年代以后,俄罗斯官僚群体实际上建构了一个控制一切的垂直权力体系,这会对俄罗斯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形成掣肘^①。我国学者认为,俄罗斯的腐败治理关乎精英团队的支持度与能否形成稳定的高层权力体系^②。因此俄罗斯政治领袖相继展开系统性的反腐行动,并将反腐败问题提高到国家战略的程度^③。但是,由于腐败现象程度深、规模大,且已经形成了某种固有的社会文化心态,因此反腐败措施的效果并不明显^④,因此俄罗斯的反腐之路还需逐渐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从分散反腐向系统反腐转变^⑤。

(二) 政治互动

从政治互动的角度,我国学者主要的关注点集中在政党与杜马、市民社会、政治文化与思想三个主要方面。这证明,我国学者除了将俄罗斯政治看作一系列制度与机构之外,也将其视为各个社会集团力量此消彼长不断平衡的互动过程。我国学者认为,这一过程至少体现为三种形态:其一,作为政治代表的政党政治形态;其二,作为政治参与和自治的市民社会形态;其三,作为政治价值和政治文化的思想形态。这就意味着在我国学者的观念中,俄罗斯的政治运行,首先还是表现为政党政治。政党作为政权的直接角逐者,其领袖、纲领、组织、力量直接左右政治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其次,市民社会的自治与参与也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学者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协调关系和协同治理能使政治系统顺畅运转,而政治文化与思想的作用也同样重要。虽然独立以来俄罗斯的政治思想一直处于摆脱苏联影响的空白和争论阶段,但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公民文化对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仍能取得各方的共识。

首先是政党。与国家杜马研究不同,政党研究侧重于政党制度整体的发展状况和单个政党的性质、现状与演变方向。俄罗斯的多党制从制度设计、制度变迁到现实运转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俄罗斯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至少经历了准备、分化重组、集中化三个阶段^⑥,直到立法与行政机构真正分离,立法

① 庞大鹏、金哲:《俄罗斯的“反腐败国家计划”》,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3期。

② 徐海燕:《俄罗斯反腐法制体系的阶段性:历程、内容与特征》,载《理论月刊》2016年7月。

③ 赵传君:《对俄罗斯腐败问题的深层思考》,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1期。

④ 姜森:《俄罗斯反腐困境的社会文化因素探析》,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5期。

⑤ 耿玉娟:《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律手段研究》,载《郑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⑥ 潘德礼:《浅析俄罗斯的政党政治》,载《东欧中亚研究》1994年第2期;章平:《俄罗斯政党组织的发展和现状》,载《今日东欧中亚》1997年第1期。

机构以党团形式运作之后才初见雏形^①。有学者评论道，20世纪初期和末期俄罗斯两次建设多党制的尝试有着相似的表现：都是面临危机的应对措施，都经历了弛禁—失控—集权循环，都出现各党派与民族主义势力合流的情况^②。显然，俄罗斯的多党制度具有鲜明的过渡特征，有学者就将其归纳为超前、不稳定、不完善、不成熟四个特性^③。2000年前后，由于《政党法》通过，中派政党联合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俄罗斯的多党制度逐渐趋向稳定，形成中派为主、左翼削弱、右翼低迷的基本格局^④。有学者认为，虽然俄罗斯的多党制正在逐渐规范化，但仍然存在政党发育不足、作用受限、与政权脱节等问题^⑤，具体表现为议会多数党、政权党、执政党三个角色并不重合。也有学者直接将其定义为“无执政党”的多党制^⑥。还有学者认为，转型国家新建立的多党制由于政党本身的不成熟，实际上并不能控制局势，填补真空的只能是政治强人和权威主义^⑦。一个有力的例证是，虽然2012年政党改革以后俄罗斯再次涌现许多政党，但它们实际上并没有能力直接挑战议会主要政党的地位^⑧。

俄共研究是俄罗斯政党研究中的重要主题。俄罗斯共产党是1991年以后经过艰难斗争重新成立的新的共产党人组织。我国学者认为，1993年以后，俄共的思想路线出现了重要转折。这种转折具体体现在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理论、重新认识党的性质、重新认识苏联社会主义危机的原因、修改建党学说、调整经济纲领等方面^⑨，因此俄共也成了俄左翼政党中除极左和温和派以外的中间主流力量^⑩。90年代，俄共虽然在艰难的局面中迅速崛起，具备了争取政权的能力，但

① 庞大鹏：《论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演变》，载《国际论坛》2003年第4期。

② 陈新明：《20世纪俄罗斯两次社会大转折中的多党制》，载《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6期。

③ 王立新：《试析转轨时期俄罗斯的政党制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9年第5期。

④ 李兴耕：《俄罗斯政党的最新动态》，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8期；王正泉：《俄罗斯政党格局的新变化》，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田永祥、刘世丽：《俄罗斯〈政党法〉的出台背景、主要内容及影响》，载《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2期；范建中：《俄罗斯政党政治的现状和走势》，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6期；徐向梅：《俄罗斯政党制度发展与法律规制建设》，载《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6期。

⑤ 李兴耕：《转型中的俄罗斯政党制度》，载《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3期；薛福岐、李雅君：《俄罗斯政党制度及其改革》，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1期。

⑥ 唐贤兴：《无执政党的政治：后苏联俄罗斯政党制度的变迁》，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⑦ 陈新明：《俄罗斯政党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原因分析》，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1期。

⑧ 李兴耕：《“普梅换位”以来俄罗斯政党的最新动态》，载《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2期。

⑨ 王金存：《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新方针和新策略》，载《国外理论动态》1995年第9期；

⑩ 章平：《俄罗斯左派政党的演变、现状及前景》，载《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3期。

我国学者认为，一方面，俄共仍然面临强大的内外压力^①，另一方面，这一现象与民族主义、传统观念密切相关，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俄共复兴等同于社会主义在俄罗斯的复兴^②。况且，俄共自身的保守性与非建设性，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和执着于吸引贫困阶层而非社会大多数人的指导方针，成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政党的两难选择都决定了其纲领的局限性，导致其很难适应社会主流意识的发展^③。短期内，俄共将很难摆脱这种困境^④。虽然俄共已经作出了许多战略调整，如转向议会外工作，向列宁主义回归等，但未能在转变观念、调整定位、解决财政、重建社会基础、实现党员年轻化等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⑤。相对而言，“统一俄罗斯”党作为一个2001年以后由中间派系合并而来的政党，反而得到了政权的支持，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有学者评论，统俄党的迅速发展使俄罗斯的多党制实际上出现了一党独大的格局。而统俄党对政权的支持和依赖虽然使其影响迅速扩大，却也造成了对政权的高度依赖性，从而造成了强总统、弱政党的现象^⑥。也有学者指出，统俄党这样的“政权党”无法成为执政党，并不一定会成为多数党，实际上是多党制不完善、不成熟的表现^⑦。同时，统俄党的内部分歧还随时间的发展和地位的巩固逐渐激化^⑧。而在2007年以后，统俄党相继把“主权民主”“普京计划”“保守主义”作为自己制度化的政治价值，这就使它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并没能多数党、政权党、执政党分离的问题上取得突

① 阎晓东：《俄共在总统选举中失利的原因及其前景》，载《今日东欧中亚》1996年第5期。

② 王守杰：《析俄共复兴与叶利钦当选》，载《今日东欧中亚》1996年第5期。

③ 李雅君：《俄罗斯共产党：发展历程及其势衰原因》，载《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6期；王立新：《试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理论新探索》，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4期。

④ 臧秀玲：《普京执政以来俄共的新探索及其困境》，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4期；聂运麟：《普京的策略与俄罗斯共产党的困境》，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李瑞琴：《当代俄罗斯社会主义党派的多样化特征》，载《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

⑤ 戴隆斌：《俄罗斯共产党的现状、问题及前景》，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6期；刘淑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困境与出路》，载《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6期；周尚文：《俄共缘何衰落》，载《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李兴耕：《新世纪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的嬗变及其内部争论》，载《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5期；刘淑春：《为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而斗争——俄共十三大述评》，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4期；李亚洲：《浅析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现代化》，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4期。

⑥ 李兴耕：《“统一俄罗斯”党的理论与实践评析》，载《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3期。

⑦ 杨喜昌：《俄罗斯“政权党”现象分析》，载《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4期；王树春：《俄罗斯政党政治中的“政权党”现象分析》，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范建中：《俄罗斯“政权党”能否成为执政党》，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⑧ 李兴耕：《“统一俄罗斯”党内的意见分歧和争论》，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破性进展^①。

其次是市民社会。90年代的俄罗斯经历了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不断变动重组，不断重构新的社会利益分配模式和社会阶层。对于俄罗斯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有学者指出，由市场经济牵动的产业结构大调整使得不同职业的人在收入上逐渐处于不同的层次^②。简而言之，基于财产数量的经济标准替代政治标准成了划分社会阶层的依据。在此期间，权力因素的渗入，使得权力与资本两个因素成为决定新社会格局中阶层归属的主要标准。我国学者认为，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分化与转型过程存在分化速度快、极化程度高、区域差别大、精英严重分化、出现新阶层等特征^③，出现了大资产阶级、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精英、边缘人群等社会阶层^④。对于社会转型的过程，我国学者总结道，转型国家的阶级变化具有特殊性，权贵和官僚阶层很容易实现权力向资本的转化与结合，从而完成对政治与社会权力的继续甚至垄断控制^⑤，其结果就是剧烈的经济分层不仅没有形成橄榄形的现代性社会结构和成熟稳定的中产阶级，反而催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严重影响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⑥。同时也有学者指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具有“制造性”的特点，其动力来自于精英自上而下的推动。因此转型过程呈现出断裂的特征。如何处理建构与自发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内在积极性的生成，是俄罗斯能否顺利改革的关键因素^⑦。最后，利益集团虽然不直接构成政治运行的一环，但它的影响却覆盖了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并且往往能直接对政权与决策构成影响。利益集团是否强大，通常标志着国家利益被劫持的程度是否严重，也深刻影响着—个政权的相对独立性和公正性。有学者按成员将俄罗斯利益集团分为金融工业集团、地方利益集团、军事工业集团三

① 李兴耕：《以“主权民主”为基础的发展战略——“统一俄罗斯”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综述》，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2期；那传林：《“统一俄罗斯”政党政治价值演化初探（1999~2008）》，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1期。

② 李景阳：《俄罗斯转轨时期社会利益的再分配》，载《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1期。

③ 张树华：《转轨时期俄罗斯社会的分层与结构转型》，载《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4期；徐向梅：《俄罗斯的贫富差距与社会分化》，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④ 王立新：《试析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社会结构》，载《今日东欧中亚》1999年第5期；庄晓慧、侯钧生：《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与社会阶层分化》，载《社会》2008年第2期。

⑤ 董晓阳：《俄罗斯官僚资产阶级是如何形成的》，载《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6期。

⑥ 汪宁：《俄罗斯“中产阶级”论析》，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李景阳：《俄罗斯：社会结构与政治格局》，载《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4期；黄军甫：《社会结构变迁与俄罗斯政治转型》，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第2期。

⑦ 李宏图：《当代俄罗斯社会转型特征初探》，载《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4期；潘大渭：《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思考》，载《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期。

类^①，也有学者按目标将其分为经济政治利益、民族宗教种族等社会政治利益、全社会公共利益和金融工业寡头四类^②，还有学者认为，当前俄罗斯的商业寡头实际上已经被官僚利益集团所取代^③。我国学者认为，俄罗斯利益集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和外交决策等方面^④。我国学者指出，2000年以前，俄罗斯的利益集团主要体现为金融寡头干政^⑤，即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因利益一致而呈现的并列状态。这种状态最终会被打破，但无论何者占据上风，俄罗斯的政治都会体现为以垄断为特征的政治状态^⑥。

最后是政治文化和思想。我国学者认为，为了摆脱苏联的影响，俄罗斯政治领袖在很长时间内都刻意保持了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空白状态，任由多种思潮在社会上自由发展、自由争论。一部分学者根据俄罗斯对自身与西方关系的认知，将其社会思潮归纳为斯拉夫主义、大西洋主义和欧亚主义三类^⑦，另一部分学者则根据俄罗斯对政治发展道路的认识，将其社会思潮归纳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等几类^⑧，也有学者将其细分为八类或十二类^⑨。实际上，无论哪种分类方式，其核心分歧都在于俄罗斯政治发展的道路选择问题。我国学者认为，在趋于稳定之前的90年代，俄罗斯的意识形态争论至少经历了自由主义主导、爱国主义和大国主义主导、探索国家思想三个阶段^⑩。在此期间自由主义由盛转衰^⑪，社会主义由弱变强^⑫，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诞生发展并成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⑬，倡导“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

① 董晓阳：《俄罗斯利益集团》，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

② 陈效卫、王春永：《利益集团——俄罗斯政坛上的新生力量》，载《国际政治研究》1998年第4期。

③ 杨成：《新官僚利益集团的崛起与俄罗斯特色的资本主义》，载《当代世界》2008年第2期。

④ 庞大鹏：《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载《东北亚论坛》2001年第4期；冯玉军：《俄罗斯利益集团与外交决策》，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2期。

⑤ 宋锦海：《金融工业集团的形成及其政治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2期；田永祥：《俄罗斯政党与金融企业集团的关系》，载《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2期。

⑥ 李永全：《俄罗斯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关系浅析》，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4期；农雪梅：《俄罗斯政权与寡头关系的演变》，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4期。

⑦ 周尚文、黄军甫：《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俄罗斯政治思潮分析》，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2期。

⑧ 董晓阳：《俄罗斯三种社会思想谁主沉浮》，载《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4期；郭丽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政治实践》，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4期。

⑨ 张树华：《当代俄罗斯社会思潮透析》，载《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6期

⑩ 关贵海：《论俄罗斯转型期的意识形态》，载《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2期；张树华、刘显忠：《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⑪ 李中、黄军甫：《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俄罗斯自由主义》，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⑫ 黄军甫、姜琦：《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载《国际观察》2001年第6期。

⑬ 姜毅：《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载《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2期。

则在俄国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涵义^①。而在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的政治领袖开始秉承超越左右之争的“第三条道路”即中间主义，结合国家主义与爱国主义塑造一种近似的官方意识形态^②。在对自我与西方认知方面，普京则选择了抑制极端民主主义^③和激进民族主义，引导推行温和民族主义^④。近年来，俄罗斯官方政治思想中保守主义的地位日益提高，其内核则是“主权民主”与“普京计划”^⑤，具有国家主义、反西方主义和传统主义三方面内涵^⑥。转型期间的俄罗斯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始终留白且充满分歧和争论，但在建构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方面仍然基本能达成共识。我国学者认为，东正教和专制制度思想是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⑦，其目标是建立一种公民文化^⑧，但传统文化对实现这一目标有着不小的阻碍^⑨。

（三）政治精英

从政治精英的角度，我国学者主要是对叶利钦、普京、梅德韦杰夫的执政理念和决策偏好进行分析，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宏观上概括俄罗斯政治精英群体的作品^⑩。在一个成熟、稳定的政治体中，政治领袖的作用和功能通常在于决策，而对政治体制本身的影响比较有限。但在转型国家，特别是俄罗斯的语境中，政治领袖除了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也兼具极强的创制能力。简而言之，在我国学者看来，转型国家的政治领袖和政治精英由于承担着推动改革和维护稳定的双重任务，往往必须努力保持四方面的平衡。其一，维护中央权威与适度分离权力的平衡。这里既包括横向上的权力分离，也包括纵向上的权力下放。与此同时，维护中央权威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改革期间政府需要及时对许多问题作出回应，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个层级和支系的权力机关需要总体协调。其

① 李兴耕：《俄罗斯的“第三条道路”思潮》，载《社会科学》1999年第7期。

② 白晓红：《普京的“俄罗斯思想”》，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2期；邱芝：《探析俄罗斯政治文化价值的建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1年第5期；周尚文：《“俄罗斯思想”与俄罗斯社会转型》，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4期；汪宁：《用“新思想”占领意识形态的“真空”》，载《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2期。

③ 左凤荣：《试析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3期

④ 张昊琦：《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3期。

⑤ 庞大鹏：《当代俄罗斯的保守主义》，载《欧洲研究》2009年第3期；

⑥ 张昊琦：《俄罗斯保守主义与当代政治发展》，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3期。

⑦ 刘莹：《俄罗斯民族认同中的政治文化指向》，载《西伯利亚研究》2008年第3期；郭小丽：《王权的图腾——试析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6期。

⑧ 刘洋：《公民文化的构建与俄罗斯政治发展》，载《西伯利亚研究》2010年第2期。

⑨ 祖雪晴：《当代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演变》，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4期。

⑩ 李雅君、张昊琦：《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演变》，载《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6期。

二，改革创新与制度建设方面的平衡。改革往往意味着对既有规则和程序的突破，但如果一味突破法律和制度，则会造成其权威的丧失。因此政治领袖通常需要在创制、建制的同时尽量保持依法依规执政。其三，尊重传统与发展变革之间的平衡。转型时期政治领袖必须保持思想、价值、政策上的相对连续性。断裂式的转变不仅容易使社会陷入分裂和对立，也会大大迟滞社会对改革理念与政策的接受速度。其四，积极进取与适度保守之间的平衡。转型常常意味着政治社会体制的深刻变革，而顺利变革事关各个社会阶层的适应速度和适应能力，因而变革的速度还必须与社会的承受能力相适应。

对于叶利钦，我国学者一方面肯定他改革的勇气与努力，另一方面也指出他所造成和遗留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叶利钦及叶利钦时代的研究日趋客观，关注点日益转移到他对转型期间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具体影响方面。肯定叶利钦的作品大多出现在苏联解体前及90年代初期，一部分学者将其称为苏联著名改革家^①，并将其政治生涯命名为“叶利钦现象”^②，意在赞扬叶利钦推动改革的勇气与深入群众的行为风格。宪法危机之后，学界开始将叶利钦作为俄罗斯的政治领袖、俄罗斯政治发展的集中代表来进行研究。典型的研究成果包括总统选举^③、内外政策^④、政治走向^⑤等等。对叶利钦持否定态度的作品在90年代中后期逐渐增多。有学者也用“叶利钦现象”来归纳俄罗斯90年代的政局，但其内涵已经变为政局混乱、经济衰败，领袖却能不断获得连任的反常现象^⑥。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叶利钦之后的执政者必然面临贫富差距、腐败犯罪、多党竞争、宪法改革、文化多元、央地关系与民族矛盾等诸多挑战^⑦。我国学者认为，政治领袖在过渡时期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改革时期也应该注意不能为改革的目的而牺牲制度建设^⑧。虽然叶利钦时代并未真正按宪法规则形成三权分立政治秩

① 朝阳：《苏联著名改革家，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鲍·尼·叶利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7年第2期。

② 舟山：《叶利钦现象与改革》，载《世界知识》1989年第14期。

③ 徐葵：《从俄罗斯总统选举看叶利钦时代》，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5期；邢广程：《“中间选民”与叶利钦当选》，载《世界知识》1996年第15期。

④ 邢广程：《叶利钦连任后的内外政策趋向》，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5期；许新：《叶利钦连任总统后俄罗斯经济政策走向》，载《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9~10期。

⑤ 潘德礼：《叶利钦连任总统后俄罗斯未来政治走向》，载《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9~10期。

⑥ 郑异凡：《叶利钦现象析》，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

⑦ 黄宗良：《叶利钦执政年代的结束与俄国的政治前景》，载《国际政治研究》1999年第4期；黄宗良、关贵海：《叶利钦的政治遗产与普京的政治走向》，载《今日东欧中亚》2000年第4期。

⑧ 叶自成：《叶利钦现象、叶利钦时代与叶利钦遗产》，载《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3~4期。

序,但三权之间相互制衡的基本关系已经确立^①。同时叶利钦时代历经国家主权独立、国家机构重新建立、巩固国家机构与构建新俄罗斯国家观念四个过程,俄罗斯还是最终建立了国家关于政治发展的理念表述逻辑^②。

对于普京,我国学者最为关注的部分是其政治价值、政治理念和外交战略。从政治价值的角度,我国学者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普京在就任之初提出的一系列价值观是借民族主义否定民族虚无主义和世界主义,借国家权威调整自由主义^③。很多学者认为,普京已经实际上放弃了全面西化的倾向^④,所采取的“亲西方”态度更多是一种务实策略而非价值取向^⑤,他秉承的是一种烙印着多重价值的实用主义思维^⑥。也有学者认为,普京的政治价值有家庭与军队两大支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非自由主义”甚至“反自由主义”的立场^⑦。从政治理念的角度,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强国与振兴经济,市场和民主道路,渐进、稳定的经济发展方式,强有力国家政权以结束对抗,总统为核心的执行权力,外交为内政服务的务实原则六个基本原则^⑧。也有学者将其总结为加速经济发展与加强中央权力两个轴心,实行政治上的集权化与经济上的自由化^⑨。还有学者认为,普京在执政的一、二任期内已解决了国家定位、发展方向、发展途径三个基本问题^⑩,将叶利钦的个人权威主义转变为自己的国家权威主义^⑪。从外交战略的角度,有学者认为普京强调俄罗斯的欧亚属性^⑫,并且对全球化和西方的态度也从第一任期的积极参与、建立广泛伙伴关系逐渐演变为否认普世价值、强调本国的独特性与合理性。简而言之,普京的两个任期内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到新斯拉夫主义的演变^⑬。

对于梅德韦杰夫,我国学者则主要分析其接任总统期间,延续普京既定执政

① 徐向梅:《俄罗斯政治中的叶利钦因素》,载《今日东欧中亚》2000年第2期。

② 庞大鹏:《叶利钦时代的政治转型——以“国家性”观念为视角》,载《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2期。

③ 李静杰:《普京的思想和政治倾向》,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2期。

④ 张树华:《普京与俄罗斯社会的未来》,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6期。

⑤ 黄宗良:《普京“亲西”辨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4期。

⑥ 丁佩华:《普京治国思想初探》,载《国际观察》2001年第1期。

⑦ 冯绍雷:《“说”与“不说”的辩证法——也评普京总统的年度国情咨文及其反应》,载《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2期。

⑧ 许志新:《普京的政治思维与实践》,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5期。

⑨ 陆南泉:《普京的治国理念与俄罗斯的未来》,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2期。

⑩ 汪宁:《“普京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6期。

⑪ 赵龙庚:《主权民主:普京对俄罗斯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和平与发展》2007年第2期。

⑫ 左凤荣:《俄罗斯的民族传统与普京的强国战略》,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6月。

⑬ 郑羽:《普京外交思想的演变:由现实主义到新斯拉夫主义》,载《外交评论》2008年8月。

理念和路线的程度。一部分学者认为，普京在卸任前通过的“普京计划”已经为俄罗斯各界所接受，成为未来数年俄罗斯既定的发展战略^①。俄罗斯政治精英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分别以工业化、后工业化为核心，分别体现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梅德韦杰夫所选择的现代化道路只能也必然会是普京计划的一部分^②。但在梅德韦杰夫即将卸任时，一部分学者的观点有所改变。学者们发现，虽然总体上保持了普京既定的发展战略，但梅德韦杰夫在许多问题上依然表现出了与普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从政治理念的角度，这种差异表现为二者对国家与个人、国家与社会间理解的不同^③；从历史理念的角度，这种差异表现为对苏联评价的不同^④；从改革与转型的角度，虽然二者都主张国家现代化，但二者的现代化路线在含义、目标、速度、领域等方面都不相同。我国学者认为，梅德韦杰夫的价值观得到俄罗斯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与支持，普京即使连任也必须考虑它的影响^⑤。

2012年，梅德韦杰夫并未寻求连任，而是主动提出让普京参选总统。一方面，学者们所普遍表达的对梅德韦杰夫与普京之前分歧引起对立的情况就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学者们也开始继续思考普京再次执政后会采取怎样的执政思路。自此，一个比较清晰的“普京主义”已经形成，我国许多学者尝试对其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有学者认为，普京仍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崇奉者，但他也同时非常推崇法治、秩序与强大的政权。因此在他的政治思想中会出现一定的矛盾性^⑥。有学者将普京主义概括为保守主义倾向，具体体现为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经济上的混合所有制与保护主义、社会文化上的反西方主义与传统主义^⑦。也有学者指出，西方与俄罗斯对“普京主义”的理解存在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普京主义具有清晰的内在逻辑，与俄罗斯国家特征与历史传统一脉相承，可以概括为政治上的控制性、经济上的政治性与外交上的外延性，其本质是为了解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转型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调整问题。普京治国理政也相应地体现出

① 庞大鹏：《“普京计划”的延续——2008年梅德韦杰夫总统国情咨文政治内容评析》，载《当代世界》2008年12月。

② 李中海：《梅德韦杰夫经济现代化方案评析》，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2期。

③ 许志新、李雅君：《梅德韦杰夫与普京治国理念的异同比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2008年4月29日第3版。

④ 张盛发：《试析普京与梅德韦杰夫分歧》，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4期。

⑤ 陆南泉：《梅德韦杰夫的价值》，载《学习时报》2011年10月10日第2版。

⑥ 徐向梅：《普京的俄罗斯式政改和整控》，载《学习时报》2013年3月18日第2版。

⑦ 关雪凌、张猛：《普京新保守主义解析》，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两个基本特点：以大国主义、强国思想、国家作用和主权民主为内核的俄罗斯保守主义作为观念共识；以动员型模式实现追赶型发展^①。还有学者指出，过去“普京主义”更多地利用路径依赖实现了国家的自主性，未来要得到发展，就必须逐步减少政权合法性对传统因素的依赖，让国家成为不受理念制约，却能发挥杠杆调节作用的发展实体^②。

二 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与进程

在采取动态的政治发展与进程的视角时可以发现，我国的俄罗斯研究在 40 年的发展中主要关注其社会政治转型之路。核心问题是转型 30 年来，俄罗斯政治的变化是什么？俄罗斯为什么会发生剧变？为什么会从一种政治系统转向另一种政治系统？当前俄罗斯这一政治系统未来会向何处去？

我国学者认为，无论苏联时期的政治发展还是当代俄罗斯的政治转型，都属于其国家现代化历程的一部分^③。正像关注苏联社会主义政权为何失败一样，中国学者对俄罗斯政治变革的热切关注，既有学术的原因即探索人类社会共同的政治发展规律和不同的政治发展途径，更有现实的原因即总结俄罗斯民主政治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借鉴^④。因此总体而言，我国 40 年来对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苏联解体和民主转型两个部分。解体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反思苏联骤然解体的原因，转型研究则旨在判断当代俄罗斯政治是否是民主政治，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它有什么优势与缺陷，在发展过程中有什么经验与教训。

（一）苏联解体研究

苏联解体对世界来说都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政治事件，而这一事件对中国冲击尤甚，因而苏联解体也成为 90 年代中国学者研究的重大主题之一。参与讨论的远不止俄罗斯研究的学者，甚至远不仅是政治学者。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几乎所有人文社会学科都对苏联解体进行过反思，提出过数十甚至上百种可能的理论假设。单从政治学的角度，至少可以分为苏共问题、体制问题、精英

① 庞大鹏：《“普京主义”析论》，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② 刘莹：《“普京主义”的路径依赖与国家自主性》，载《国际关系研究》2014 年第 5 期。

③ 陆南泉：《俄罗斯转型与国家现代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④ 俞可平：《俄罗斯民主：中国学者的视角》，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 年第 2 期。

问题、民族问题等数种主要的观点。在我国学者看来，其一，苏联解体是一个综合性事件，不是单一原因诱发的。其中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远因也有近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既有微观原因也有宏观原因，既有下层原因也有上层原因，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其二，苏共作为执政党，无论是其自身建设还是对国家意识形态、发展方向与模式、大政方针的把握，对于政治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其三，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整体、稳步、持续进行，以适应社会经济的需要。虽然任何体制都不是完美的，但僵化、低效、迟缓的体制变革如果与社会变革差距过大必然会引起严重后果。其四，应合理配置政治精英所拥有的权力，对其施予相应的规范和限制。在苏联的语境下，政治精英对体制的影响很大，且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这样的群体一旦产生集体利益以代替国家利益作出错误决策将很难得到纠正。其五，应妥善处理各种内部矛盾，不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一切问题。内部矛盾往往有着复杂的、多重的属性，以政治手段集中解决一切内部矛盾并不一定比分离矛盾、分别解决更加有效。

首先是苏共的原因。苏共在苏联政治体制中的首要地位不言而喻，它无论对于苏联的政治制度、程序、机构还是对于苏联的社会都有着强大的控制能力。不难理解，当苏共本身出现问题时，苏联的政治必然难以维持正常运转。我国许多学者认为，苏共本身的蜕化和变质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从苏共作为执政党的角度，其原因主要表现为五点：其一，苏共的党纲党章出现了性质变化，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二，苏共内部出现严重腐败，苏共党内监督机制失灵；其三，苏共的党建工作严重滞后，苏共中央与基层党组织、与群众失去联系；其四，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出现重大失误，从思想上瓦解了自己的基础；其五，苏共忽视自身文化建设，丧失文化领导权。首先，党纲与党章反映了党的总体路线。有学者认为，赫鲁晓夫上台之后，不是选择对党进行改革，而是将所有问题全盘归咎于斯大林，同时全面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就使得后来成长起来的苏共历代领导人日益背离苏联，最终造成苏共的败亡^①。其次，苏共逐渐出现了严重的腐败。我国学者指出，腐败不仅使得苏共的作风败坏，更重要的后果是导致了改革的变形。由于严重腐败，社会财富大量集中在权贵阶层手中，其结果就是市场化改革使得苏共各级官员获利

^① 魏泽焕：《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错误建党思想是苏共解体的一个重要历史根源》，载《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4期；张全景：《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及借鉴意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李慎明：《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载《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

最大,并不能惠及人民群众,使苏共完全丧失民心^①。再次,赫鲁晓夫执政之后,苏共没能一改斯大林时期权力高度集中的缺陷,反而由于忽视党的建设,催生了一个严重官僚化的干部群体。这使得苏共中央与基层之间,苏共与群众之间日益脱节,从而丧失了人民的支持^②。另外,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还是意识形态的变异。苏联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日益僵化、教条化、空洞化,成为了空泛的口号。有学者指出,苏共领导人从否定历史到全盘自我否定,实际上体现了其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信仰的动摇^③。最后,也有学者从文化建设角度反思苏共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背离马克思和列宁主义,使得苏共在思想意识上出现了空白期,这就使得苏共丧失了对苏联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从而使苏联社会的思想陷入混乱与争论^④。

其次是体制问题。对于苏联体制的问题,我国学者中至少包括左、右、苏共蜕变和体制僵化四个类型的观点^⑤。简而言之,苏联的体制问题主要包括党的体制问题、党政体制问题、干部体制问题和权贵阶层问题四个方面。对于苏联的体制,我国学者将其总体概括为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也有一部分学者将其直接总结为僵化的斯大林体制^⑥,其特点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度集中,广泛实行委任制,实行终身制并指定接班人等^⑦,同时缺乏社会主义法治的保障^⑧。有学者认为,苏联体制即斯大林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过“左”的路线和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与自由的

① 黄苇町、王长江:《从苏共垮台看腐败》,载《理论前沿》1999年第13期;季正矩:《腐败与苏共垮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4期。

② 马句:《共产党不能脱离群众——苏共失权、苏联解体的反思》,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4年第2期;谭继军:《苏联解体前夕苏共基层党组织组织资源的丧失》,载《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3期;李燕、张树华:《苏联解体前苏共基层党组织与党员思想状况分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1期。

③ 马岩:《意识形态与苏联解体》,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周尚文:《意识形态堤坝的崩溃与苏联解体》,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徐海燕:《步入歧途:苏联解体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蜕变》,载《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

④ 倪稼民:《从苏共自身文化建设问题看苏联解体》,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张士海:《论戈尔巴乔夫的“列宁主义观”及其启示——兼谈苏共“文化领导权”丧失与苏联解体》,载《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1期。

⑤ 黄宗良、肖枫、俞邃、季正矩:《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苏联剧变20周年若干问题的对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

⑥ 宫达非编:《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陆南泉、姜长斌:《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⑦ 姜爱凤:《苏联解体原因综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1期;陆南泉:《有关斯大林模式若干重要问题的再思考》,载《社会科学报》2007年6月21日。

⑧ 赵曜:《苏联剧变和解体是内部出了问题》,载《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

矛盾^①。当然也有作者认为，苏联体制并非斯大林时期就固定不变，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都对体制本身作过改革，因此不应全部归咎于斯大林^②。斯大林体制有其合理的部分，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难点就在于区分民主集中制中各自的程度和界限^③。有学者总结，苏联的问题在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异化以及民主集中原则的割裂。苏共的变质始于斯大林时的高度集中，终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极端民主，几十年中的改革都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架，因此整体呈现出一个长期极左向骤然极右的反弹过程^④。

对于党的体制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其根本问题在于缺乏党内民主，使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生命力遭到削弱，反而造成了极端的官僚主义的集中制。这不仅表现为党内权力体制发生背离党章的扭曲，也体现为党内合理意见缺乏表达的机制，同时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权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⑤。对于党政体制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导致国家权力集中于苏共，苏共权力集中于苏共中央，因此巩固苏共中央的权力结构是维系苏联存在的命脉。但苏共领导人主动放弃民主集中制，既有的权力格局被打破，加盟共和国拥有退出权利的同时解除了服从苏共的义务，这就使得苏联的解体成为必然^⑥。对于苏联的干部体制，也有学者指出，苏联长期实行的干部“罗名制”使得官僚体系出现凝固型和继承性的特征，助长了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造成了党政机关职权重叠，也严重破坏了党内的监督制约机制，同时使得苏联社会形成了等级制度和独立的官僚特权体系^⑦。对于权贵阶层，有学者认为，苏联的体制使苏共党内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或称官僚特权阶层），其特点是对权力的垄断和控制^⑧。这个权贵阶层不仅割裂了党和人民的关系，同时形成了其特殊利益：既不愿意转向民主化，也不愿意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因此实际上带领国家走上了资本主

① 高放：《苏联剧变三部曲：矛盾、危机和灭亡》，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2期。

② 俞邃：《关于斯大林评价问题》，载《历史的风——中国学者论苏联解体和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③ 吴恩远：《关于“苏联解体教训”一些流行观点的检讨》，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3期。

④ 肖枫：《苏联解体二十周年》，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3期。

⑤ 黄宗良：《教条主义与苏联的解体》，载《国际政治研究》1992年第4期；黄宗良、肖枫、俞邃、季正矩：《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苏联剧变20周年若干问题的对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

⑥ 沈宗武：《论苏联共产党高层权力结构的变迁与苏联解体》，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⑦ 戴隆斌：《苏联“罗名制”的形成、特点及其影响》，载《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3期。

⑧ 黄宗良：《苏联的教训：要着力抑制和消除官僚特权阶层》，载《中国与世界观察》2007年第1期。

义的道路^①。

最后是民族问题。如果说苏共蜕变和体制僵化是苏联解体的深层根源，那么民族地区矛盾和分离主义就是苏联解体的直接诱因。从民族矛盾引发苏联解体的角度，我国学者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苏联的联邦制存在天然缺陷；其二，苏联对民族问题的理解，制定的民族政策都存在重大失误；其三，民族问题是政治、社会、经济矛盾激化的直接表现。首先有学者认为，联邦制国家本身在维护中央权威方面就面临比单一制国家更大的挑战^②。苏联的联邦制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缺陷，具体体现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强调差异与分散的联邦制之间存在逻辑矛盾，最终导致俄罗斯民族本身成为政权的化身^③。我国学者指出，以民族为特征组建的联邦制本身就不利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④。而苏联的联邦制恰恰只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且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在法律上强化了群体及其权利^⑤。这种缺陷自苏联建立之后由于教条主义的原因被长期固定了下来，在几十年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联邦制的变形^⑥。其次，我国学者认为，苏联的党政领导人没有对民族问题的复杂性、重要性和长期性保持清醒的认识。民族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在社会主义阶段过度强调甚至人为制造民族同化与融合，取消或否认民族问题都是违背历史规律的^⑦。苏联领导人对此认识不足，剥夺和削弱民族自主权，强制采取民族迁移等政策，采用阶级斗争手段解决民族问题，结果导致留下深刻的积怨^⑧。最后，我国学者认为，民族问题只是一个直接表现，苏联末期的民族矛盾集中爆发，实际上是政治、经济、社会矛盾激化和催化的结果，导致在文化上形成了民族回归主义、对外事务上形成了民族孤立主义、经济上形成了民族自立主义，并最终融合成了民族本位主义^⑨。我国学者将苏联的民族问题归纳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被永久化和绝对化，同时

① 季正矩：《权贵阶层与苏共的腐败及其垮台》，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4期；王长江：《中外学者关于苏共失败原因的最新版》，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2期。

② 王丽萍：《苏联解体的国家结构特征分析》，载《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3期。

③ 孙午生：《从联邦制国家形式析苏联解体原因》，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1期。

④ 常庆：《从民族角度看苏联解体》，载《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5期。

⑤ 杨恕：《关于苏联联邦制的再思考》，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4期。

⑥ 张祥云：《关于苏联联邦制的几点思考》，载《世界民族》2004年第4期。

⑦ 陈建樾、周竞红、果洪昇：《教训与反思：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十大失误》，载《东欧中亚研究》1994年第1期。

⑧ 初祥：《苏联斯大林时期强制迁移少数民族及其后果》，载《世界民族》1998年第3期；张盛发：《苏联解体原因再探》，载《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4期；杨顺清：《十年后的回顾与反思——民族问题对苏联解体的影响及其教训再认识》，载《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

⑨ 薛衍天：《试论俄罗斯民族主义与苏联解体》，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3期。

存在的问题被民族政策的失误所放大，在社会矛盾加剧、经济状况没有好转的情况下实行超前民主化最终导致了解体的发生^①。

（二）民主转型研究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走上了曲折、艰辛的转型之路。对于我国学者来说，最为关注的就是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是否存在民主？俄罗斯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民主？俄罗斯还会不会建设民主政治？俄罗斯能否，又将如何走出一条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之路，建设一种“俄式民主”？

对于俄罗斯来说，“俄式民主”的具体形态、民主水平的高低和民主要素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四对关系之间的调节。其一，政治强人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政治领袖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民主转型的最终成效却取决于能否建设一个均衡的制度。在转型国家中，权力的分离和制约往往都要靠政权力量，特别是政治强人的主动推进，但过度依赖政治强人往往又会使得制度建设缺乏内生性的动力。其二，国家主义和协同治理之间的关系。国家主义对于新生的、脆弱的民主体制，特别是需要解决民族和国家问题、完成民族国家建构任务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但过度的国家主义很容易使得社会长期处于虚弱无力的滞后状态，或者对国家产生严重的依赖性，导致社会对自身的治理能力始终得不到提高。其三，民意表达和国家管控之间的关系。一个好的或者说正常的民主制度，意味着人民能真正做到当家作主，意味着民意能得到有序、合理、准确地表达，不同的民意能在利益协调机构中进行有效的竞争和协商。但过度高涨的热情或激进的民意表达则会导致社会动荡，或直接导致一些群体被排除出权力体系。其四，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公民权利的扩大无疑会增加国家的执政难度，且像叶利钦时期公民权利的过度膨胀会带来国家权力的急剧退化。当前俄罗斯的公民权利，有些并未得到确立，有些尚未得到清晰界定，有些则仍然是理论上的。如何界定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在各种领域之间的界限，将是考量俄罗斯民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

同时，对于俄罗斯来说，“俄式民主”能否突破困境和各种阻碍持续推进，能否走出一条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之路，则主要取决于三对矛盾之间的协调。其一，发展目标和改革目标之间的矛盾。对于遭受震荡的俄罗斯来说，“强国”“富民”等发展问题的解决都是国家的首要任务。同时，经济的发展也能够带来

^① 左凤荣：《民族政策与苏联解体》，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

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使社会情绪整体平稳，也有利于政治的改革。但过于注重经济的改革，很容易使社会财富高度集聚在经济发展的动力主体周围，从而造成垄断、寡头、权贵阶层、政商勾结等问题。其二，社会公平和精英支持之间的矛盾。叶利钦的经验已经证明，无论是改革还是转型都不可能在缺乏精英支持的情况下进行。骤然打破精英群体的利益，不仅无法带来稳定，反而会催生新的精英群体及其群体利益，甚至导致动荡。普京与精英达成共识逐渐过渡才是一个更好的方式。但是，过度维护精英利益，会导致转型过程中社会不公的程度加深，引发普通民众的不满，从而使改革因失去支持和动力而陷入失速状态。其三，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在旧有体制还是转型过程中，当局都会因及时回应挑战而积累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机构、程序和政策。这些解决方案最初大多是临时的措施或机构，但由于其效率而被逐渐固化为常设性质。这些方案能解决问题，维持发展，但由于其临时性的特征最终会面临效率降低的问题。与此同时，制度创新会带来风险甚至损失，使得发展速度减缓。是否有勇气主动离开安全区域进行适当的创新将会考验转型国家的智慧。

在民主转型研究中，首先是关于俄罗斯转型时期的政体特征问题。对于 90 年代的俄罗斯民主政治，我国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基本框架确立、三权分立名不副实、选举制度弊端严重、政党政治很不成熟、公民权利无法保证五个特点，形成一种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格局^①。也有学者认为，无限总统权力和严重对立的总统一议会关系是转型时期俄罗斯非均衡三权分立制度的基本特征^②。更多的学者将其总体概括为一种与西方有区别的、更近似于国家主义的、将国家政权人格化的权威主义^③，这正说明，俄罗斯处于由高度集权向民主政治过渡的阶段。有学者指出，俄罗斯的体制转型是在苏联政治高度集权、经济体制弊端丛生的背景下，以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为路径选择，得到的一个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并存、寡头集团与平民主义兼容的混合型体制的结局^④。也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的体制转型很难概括为标准的权威主义或代议民主，它更接近于二者之间的委任民

① 王正泉：《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建立及其缺陷》，载《今日东欧中亚》2000 年第 2 期；王正泉：《评俄罗斯政治体制的转轨》，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 年第 4 期。

② 庞昌伟：《转型时期俄罗斯民主政体与非均衡的三权分立制度》，载《国际论坛》2000 年第 1 期。

③ 李英男：《俄罗斯权威主义的复兴》，载《俄罗斯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④ 冯绍雷：《俄罗斯体制转型的发生、路径及其走向》，载《俄罗斯研究》2001 年第 2 期。

主政治形式^①。有学者指出，叶利钦时期的转轨道路由于苏联的失败、改革的迫切性、经济改革内容过载、对休克疗法抱有幻想、寄望于西方援助而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叶利钦所选择的转轨道路实际上背离了国情，它否定和割裂历史，照搬西方模式，且转轨方式自相矛盾，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从而引致社会分裂^②。

我国学者第二个集中讨论的主题是可控民主。尽管始终不为俄罗斯官方所承认，但在我国学者看来，“可控民主”仍是概括普京第一、二任期俄罗斯政治非常典型、完整和重要的概念。有学者将“可控民主”概括为保留若干西方民主政治的外部特征，同时政治过程又受到国家政权和统治机构的严格控制与限制，具体表现为加强垂直权力体系、打击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反对和限制寡头政治、改革政党制度、改组政府和总统办公厅^③。有学者认为，可控民主实际上就是一种准民主或有限民主的形式，即通过民主途径赋予政治领袖以超出民主程序权力的政治制度，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混合体。选择可控民主，实际上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生活方式和政治文化有密切联系，它在社会转型时期也比自由民主更能维护社会的稳定^④。有学者指出，俄罗斯政坛在普京的第一任期表现出了强化国家政权、实行总统集权；改变政党格局，形成一党为主；规范民主生活，走向可控民主的三大趋势。普京的集权措施符合俄罗斯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但这仍然是暂时性的，总体趋势决定了俄罗斯仍然不可能使集权向极权的方向发展^⑤。有学者认为，可控民主表现了俄罗斯政治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具体体现在政权依靠的对象不同、总统执政手段不同和政府部门的地位与作用不同三个方面^⑥。还有学者总结，可控民主使俄罗斯形成了相对和谐的社会政治气氛、相对团结的精英集团、中央集权的央地关系和强大的“政权党”，总体使俄罗斯趋于稳定，其消极影响和不稳定因素将会主要来自精英集团和官僚体制内部^⑦。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主题是主权民主。相对于“可控民主”，“主权民主”是得到俄罗斯各界更加广泛接受的一个概念，这意味着俄罗斯正在探索具有俄式特

① 黄军甫：《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分析》，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② 许志新、潘德礼：《再论俄罗斯社会转轨道路》，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5期。

③ 李兴耕：《关于俄罗斯“可控民主”的若干思考》，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5期。

④ 范建中：《“可控民主”与俄罗斯政治发展的走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5期。

⑤ 王正泉：《俄罗斯政坛出现三大趋势》，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⑥ 孙凌齐：《普京政治体制的特征：“可控民主” - “主权民主”》，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

⑦ 潘德礼：《浅析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及其前景》，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1期。

色的民主制度。我国有学者认为，主权民主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对盲目西方化道路的否定，对叶利钦时期“寡头式民主自由体制”的否定，对颜色革命的回应和对寻求“俄式民主”道路的强调^①。有学者将主权民主归纳为五点：主权国家根据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法律自主选择民主道路；持续增长的经济是主权民主的物质基础；强力的国家、完善的法治、受控的腐败是主权民主的必要条件；巩固的国防建设和抵御国际恐怖主义的能力是主权民主的重要保证；人口问题的解决是俄罗斯追求主权民主的现实挑战。具体措施则包括加强垂直权力体系，修改政党法和选举法保证政党格局的稳固，强化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和监督，加大反恐力度和健全反恐机构，同时设立联邦公众院以加强国家与社会间的沟通^②。有学者认为，主权民主仍然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形式，从远期来看，俄罗斯依然将会以民主为导向完善政治体制，主权民主难以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③。也有学者认为，主权民主的思想核心是诠释了主权的内涵、民主的内涵和主权与民主的关系三个方面^④，它的重要性已经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范畴，将反映俄罗斯相当一段时间的政治状态^⑤。

同时，我国学者也在不断尝试对俄罗斯民主转型进行整体概括，相关作品大致可分为深层原因和经验教训两类^⑥。从深层原因的角度，有学者将其总结为民主政治模式和经济转轨难以有机结合，同时俄罗斯社会的发育也不成熟，不适应其特殊的文化传统^⑦。也有学者认为，俄罗斯转型陷入困境是由于对民主的认识存在误区，将其意识形态化，将其与西方政治体制等同起来，过度强调其普遍性和单一性，将民主化与市场化 and 改革派等同起来，将民主抽象化、民主概念扩大化、民主进程绝对化，将民主概念庸俗化、片面化^⑧。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的转型陷入困境客观原因居多，因为它始终处于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同时作用的复杂

① 张树华：《俄罗斯的主权民主论》，载《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② 李兴耕：《普京的“主权民主”》，载《当代世界》2006年第7期。

③ 范建中、徐宜鹏：《俄罗斯的“主权民主”：由来、争议及前景》，载《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4期。

④ 庞大鹏：《俄罗斯“主权民主”思想的内涵》，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1月31日第7版。

⑤ 庞大鹏：《俄罗斯的“主权民主”思想》，载《欧洲研究》2008年第4期。

⑥ 王树春：《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制度》，载《东北亚论坛》2002年第1期；王立新：《俄罗斯的民主与民主化解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5期。

⑦ 姜毅：《社会转型与俄罗斯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4期。

⑧ 张树华：《民主的艰辛与神话的破灭——对俄罗斯十年政治转轨的分析与反思》，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4期。

结构，但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国家与社会和国家与世界的矛盾^①，有的学者则将其概括为外部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和内部权威主义政治传统之间的矛盾^②。也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的转型问题主观失误占了更大比例。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从体制上缺乏周密设计的制度安排，又缺乏对民主观念充分尊重的政治文化，因此导致政局动荡、权力危机频发^③。还有学者将俄罗斯的转型问题归纳为“东方化”治理体制和“西方化”现代化路径之间的巨大张力，导致其始终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转型过程存在间断性和跳跃性^④。这种西方化和本土化之间的摇摆，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冲突是俄罗斯的历史宿命^⑤。俄罗斯的出路将取决于俄罗斯领导人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⑥。

从经验教训角度，有学者认为，对于社会转型来说，一定要重视习惯、文化、价值等无形规则的深刻影响，它们往往滞后于正式的规章、制度，因此采用“渐进式”转型模式，以缓和的方式进行改革将会使转型进程更加顺畅^⑦。也有学者评论，从俄罗斯的经验看来，政治转轨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立法机构的重建和与行政机构的脱离过程，而宪法的制定和通过将是政治转轨的里程碑。在宪法地位稳固的情况下，才有机会在此基础上完善政党竞争和选举制度，因此以宪政制度为核心的法治化是政治转轨的必然取向。同时，作者还指出，权力斗争的核心问题是精英在价值观上的冲突，政治妥协精神是政治转轨中具有长远意义的问题，社会经济基础则是政治转轨中的重要影响因素^⑧。还有学者强调国家权力（集中与分散）与国家能力（是否有效进行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认为，二者之间的有效配置与相互协调是决定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⑨。有学者考察了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他们将

① 余伟民：《国家定位与社会转型——论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载《人文社会科学当代中国——上海市社会科学界2003年度学术年会文集》2003年。

② 徐坡岭：《全球化约束与政治传统张力——俄罗斯政治制度重构的主导因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

③ 冯玉军：《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矛盾与问题》，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3期。

④ 赵定东：《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历史动态轨迹》，载《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⑤ 关贵海：《俄罗斯政治思想变迁的历史和思想基础及其走向》，载《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1期。

⑥ 李静杰：《俄罗斯的现代化之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载《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1期。

⑦ 关海庭：《论当代中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的合理性——兼论中苏（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关海庭：《中俄体制转型模式比较研究——从价值观念看渐进转型模式的合理性》，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⑧ 庞大鹏：《论俄罗斯政治转轨的基本特征》，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3期。

⑨ 景维民、张慧君：《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兼论“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前景》，载《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3期。

俄罗斯转型时期的国家形态分为“失败国家”“依附型国家”“自主型国家”三类，强调国家的转型需要正确的观念引导，需要认识到国家本身的作用至关重要，需要认识到自主性对于转型国家的重要性^①。近年来，我国有学者归纳出了俄罗斯转型的五条重要启示：首先，民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民主化依然是世界潮流；其次，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各不相同，每个国家的民主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再次，民主政治必须有序推进，增量发展，不能急于求成；复次，推进民主必须与增进民众福祉和改善社会治理相结合，让民主造福于民；最后，制约公共权力和增进公民权利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不能有所偏颇^②。

结 论

总体而言，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俄罗斯政治研究，具有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第一，在研究队伍中有着复合的人才结构。因为中俄政治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紧密联系和相似性，中国学者在俄罗斯政治研究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中国关怀——学者们对俄罗斯政治的研究兴趣明显高于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这使得除政治学之外，国际关系、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等许多学科的研究人员都参与了对俄罗斯政治的思考与研究。但与复合学科和人才结构相矛盾的一点是，在俄罗斯政治研究领域，我国学者作品中的“通论”比较丰富，“专论”则相对匮乏。大量作品和研究人員都倾向于对俄罗斯政策与政治的格局、形势和倾向进行整体判断，但在某些专题例如政党、观念、立法、决策、精英等方面的研究则相对不足。简而言之，我国俄罗斯政治研究人员中精细化程度还有待提高。

第二，在议题设置方面有着集中的问题指向。从对俄罗斯政治结构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常偏好以中国政治的方式理解俄罗斯政治。这就使得我国学者对一些特定议题，例如政府与政党、政治领袖、意识形态的研究非常丰富。但相对的，这样高度集聚的议题设置也使得大量议题融合在一起，例如政党研究、杜马研究和意识形态研究，例如央地关系研究、民族问题研究和基层治理研究，或

^① 杨光斌、郑伟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 4 期。

^② 俞可平：《俄罗斯民主：中国学者的视角》，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 年第 2 期。

者选举研究、政党研究和政治精英研究。虽然学者所关注的研究对象必然带有自己所处环境与背景的色彩，但也应该意识到，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状态和政治运行规律有着自身的特征。议题设置带有过强的主观偏好，会影响研究的整体性与客观性。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俄罗斯政治本身与中国存在不少相似之处，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我国的俄罗斯政治研究在议题设置方面的分化程度相对不足。

第三，在研究视角方面具有明显的侧重。从俄罗斯政治进程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常以中国政治的思维逻辑分析俄罗斯政治。对于传统中国政治研究来说，权力的形成比权力的行使和影响更加重要。谁能掌握权力，他本身具有什么样的观念与倾向，往往决定了相当一段时间内政治与政策的总体走势。这样的研究对于判断一个国家，特别是权力高度集中国家的整体政治局势比较有优势。但与此同时，这样的研究方式也很容易导致研究者忽略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部分，例如中央政府政策的传导和执行，例如自下而上的政策动议机制，例如政党和杜马运行状况与中产阶级加入抗议人群间的联系等等。注重制度而相对忽略过程，重视权力的构成而相对忽略权力的实际运转，会使得对对象国政治发展判断的准确度下降，甚至无法预测、解释和评估一些极具典型性政治事件的后果和影响。

第四，在理论建构方面具有独特的研究逻辑。在总体认识俄罗斯政治时，我国学者常会带着中国问题思考俄罗斯问题。我国学者对俄罗斯如何寻找适合自己的政治道路，建设具有本土化特征的“俄式民主”，探索建立在俄罗斯历史基础上的政治学理论抱有极大的兴趣和极强的关注。因此在俄罗斯政治研究中，我国学者特别关注俄罗斯学者对本国政治的分析和总结，在整体理论和概念方面大量借鉴俄国理论，例如可控民主、主权民主、保守主义等。这一方面是由于俄国学者的理论概括与其现实政治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因此可能更加贴近俄罗斯政治的现实；另一方面也显示着我国俄罗斯政治研究本身的理论化、抽象化程度尚待提高。国外学者的理论和概念虽然不可避免地与现实政治存在一定的偏差，但国外学者作为“局外人”基于自身经验所提出的研究视角和宏观理解都是本国学者的研究所不可替代的。对同一政治结构和过程的不同视角、观点、理论的交锋也正是政治学理论本身得以发展的动力所在。

实际上，俄罗斯研究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分支，也折射了我国政治学研究中这一领域的一些特点和规律。学者之所以从事区域国别政治研究，本身一般会具

有三种可能的原因：其一，研究对象国政治秩序，判断其政治状态，预估其对周边政治局势和地区（全球）政治格局的影响；其二，研究对象国政治过程，理解其政治模式，为本国发展提供一定意义上的参考；其三，将对象国作为世界政治的一部分，进行跨国比较，或将其放在全球背景下进行探讨，以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问题，促进政治学理论发展。对于我国而言，区域国别研究则具有对应的三个目标：其一，判断对象国国内政治局势和发展方向，为外交决策提供依据；其二，分析对象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识别其中遇到的威胁和挑战，为我国政治发展提供参照系；其三，比较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制度、模式、道路选择，探索并建构出适合我国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三个目标本身也包含着区域国别政治研究的三个层面。微观的、对对象国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的精准研究是对比参考和宏观理论概括的基础；对比参考是微观研究和宏观概括的直接目的；理论概括则是对比参考和微观研究的最终使命。缺少了精细准确的微观研究，则对比参考和理论概括都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成为难以令人信服的空洞推演；缺少了与本国政治的对比参考，则无论是微观研究还是宏观理论都将失去现实动力，成为纯粹的思维游戏；缺少了高度概括的宏观理论，则微观研究和对比参考都将失去外部效度和时间效度，无法通过积累而达到社会科学理解和预判的目的。三个层面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从 40 年的俄罗斯政治研究历程来看，我国学者在作为中间层次的对比参考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政治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要推动俄罗斯政治和区域国别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者还需要在精细化和理论化两个方向上作出更多的努力。

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看，我国的政治学科恢复不过 40 年，相对于许多其他传承有序的国家还显得经验不足。但是，我国 40 年来的发展不仅蕴含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同时，40 年的发展经验也在呼唤着凝练的理论总结。学者的思想依托于时代，时代的问题也期待学者的解答。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中，“中国问题”毫无疑问占有一席之地。回答好中国问题，是我国政治学学者对国家的贡献，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也是政治学学者应当意识到并承担起的时代使命。

（责任编辑 张昊琦）